

區域間主義之研究：亞歐會議之實踐

孫國祥

(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歐盟在與其他伙伴國的交往過程中，基本上鼓勵其他區域集團的組建。區域之間的對話、合作或協議偏好雙邊的形式，尤其是在共同體能力所及的領域。因此，區域間主義對全球多層次的治理提出額外的層次，其可以促進在一種多邊或全球的背景（議程設定功能）下，透過全球規模「前討論」(pre-discussing) 甚或「前談判」(pre-negotiating) 的議題中探尋解決之道。晚近各種各樣不同深度和廣度區域和次區域安排的激增強化此點在亞歐關係的脈絡。本文探討在加速區域間主義中扮演的角色；認同建立上區域間主義和新區域主義的作用，以及為有效的區域間對話和合作，探討建制形成和制度建立的重要性，最後並提出亞歐會議對亞洲國家的意義。

關鍵字：亞歐會議、全球化、區域間主義

壹、前言：全球化對國際政治的影響

雖然全球化的科學討論有一段時間是經濟學家的特權，但隨後已有所改變而蔓延至大部分的學科。就國際關係而言，互賴和互相聯繫的共同體成為現今地球村現象的一部分，並且為(國際)政策思想家和政策制定者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全球化逐漸發展成寬廣、跨學科的主題，引起史無前例的公共討論，因為致力於減少全球化民主赤字的公民社會，已遭受全球化的強烈影響。既有文獻之中，對全球化已有許多詳盡的界定。然而，為了澄清全球化的概念，本文將其理解為一種技術驅使的社會進程，應在某種程度滿足一般的需求。作為一項在政治、經濟、社會和私人關係的因素，其中地理上的距離和時間逐漸喪失他們的重要性，同時轉化的變遷和速度取得重要性。因此，全球化是一種超越「全球市場」概象，而且並非限制在國家行為者或跨國公司。「在廿一世紀，更多不同種類的行

為者前所未有的參與國際政治，包括國家、「族裔民族的」(ethnonational)挑戰者、跨國的組織、非政府組織、公民社會行為者和運動以及跨國網絡。」¹

因此，全球化不僅包括文化和通信的加速流通，而且還包括環境和衛生威脅全球的情形，所有關注和關聯之議題大多涉及個人或全體的人類安全 (human security)。人類安全的關聯性彰顯公眾察覺是一種全球化的重要面向。全球化從而不僅止於是某種現象，今天全球化中沒有被察覺的因素仍多，而且更多的人們察覺到「世界的全球互賴」在他們的生活當中。在連接全世界人們的方面，全球資訊網扮演重要的角色，從而促成此類增長的察覺。相較於過去同樣存在的全球化現象，該項察覺是今天的全球化主要不同的因素之一。

因此，互賴不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能被許多身邊的事物所證明：全球金融市場廿四小時的運作，影響個人擁有貨幣的價值；其他區域的經濟衰退可能導致本國人民的失業；亞洲（例如台灣）的地震，可能切斷對美國工廠矽晶片的供應，從而導致大規模的停工；全世界聆聽相同的熱門歌曲；以及偶像作家的書籍幾乎在每一個機場書店中同時販售。認識到關係和依賴的潛在國際化，諸如由美國有線電視網 (CNN) 的國際媒體從而有能力引起恐懼，並且通常導致普遍性的反全球化。

因此，全球化交流密度和廣度的不斷增加，為治理帶來前所未見的挑戰。基本上，可以歸納出三類與全球化相伴，需要國際性互動以解決的全球問題，包括協調問題、公共問題以及核心價值問題。²第一類的問題係對全球各種聯繫，或對跨國界的資訊、產品、服務和資金交流的協調。第二類的問題是保護公共資源或公共財的問題。由於公共財或公共資源是非排他性的產品，因此以純粹自由市場制度配置並非適當。國內性的活動跨境影響亦為形式之一。第三類問題與核心價值觀或先驗價值的保護有關。全球化致使重要的社會價值被全世界更為廣泛的接受，諸如平等、自由和民主等道德原則可謂優先於現有的政治慣例。³

由於全球化時期該等問題應會不斷的增加，對國際行動的需求亦將隨之上升。但此論點並非意味只要有需求，相應的國際制度就會自動出現，因為民族國家仍將保護自己的主權和利益，其他諸如「搭便車」等阻礙國際合作的問題也會出現。而創建國際制度是必須付出交易成本，各國需要有可靠的資訊以決定合作是否符合自身的利益。⁴另外，它們還要付出與其他國家談判所要付出的時間和成本。儘管存在現實的障礙，國際制度仍然大幅的增長。⁵至少在可見的未來，

¹ Karen A. Mingst, *Essential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4), pp.251-252.

² 儘管此三項分類似乎已包括全球化引發的問題，但絕非詳盡無疑。其中當然還有國際安全，但此處暫不論及。

³ 有關所有秩序良好的國家都會遵守的基本政治原則之討論，參見 John Rawls, *The Law of the Peopl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⁴ 相對而言，國際制度一旦確立，就可能有助於降低其中某些成本。參見 Peter Haas, Robert O. Keohane and Marc A. Levy, *Institutions for the Earth* (MIT Press, 1993).

⁵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Global Transformation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52-57. 然而，其中某些機構尤其是國際性政府組織的增長速度並非總是與全球化的步伐直接同步。舉例而言，國際間政府組織的數量從 1980 年代以來就一直下降。見 James Hawdon,

建立和加強國際制度以應付愈來愈廣且深的互賴世界問題將逐漸攀升，儘管建立該等制度仍會遭遇困難和反對。

雖然初見之下似是而非，但全球化促進了區域內（intra-region）和區域間（inter-region）合作，因為全球化重新配置了區域的重要性。區域是一種集中和擴展的結合，補充位於中間層次社會的「去國家化」（denationalization）。切姆皮爾（Ernst-Otto Czempiel）描述該過程為：「當前世界的特徵不是全球化而是區域化。因為實際上唯有美國能主張追求一種名副其實的全球政策。而所有其他的國家，即使大如歐盟（European Union）之類的國家結合（體），僅扮演以區域為基礎範疇中行動互賴的地帶。互賴最重要的結果是國家的「去國家化」，其乃全球化概念中的固有特性，儘管並沒有清楚的表達。」⁶

互賴體系中，行為者採取的行動具有敏感性和脆弱性；因為各系統的複雜性涉及行動（或不行動）可以使用的不同傳播管道。因此，奈伊（Joseph Nye）與基歐漢（Robert Keohane）創造全球化經濟的「複合互賴」（complex interdependence）一詞，⁷其同時是逐漸強化的區域間和區域內合作的由來和結果。削減國家政策工具的效力，全球化引發新興跨國互動領域中安排的需要，以建立患難與共的未來，以及為管理全球公共財提供集體的方法，而且在一個社會的世界中提供危機管理的能力。區域內與區域間合作，或是在一種更高整合形式主權的匯聚，可以提供嶄新的政策工具以至少部分補充該情勢下國家政策的不足。雖然沒有達到全球的層級，但由區域或區域間的合作仍可提供更為緊密的脈絡，允許行為者對行動採取更多的管制與協調。沿著此方向前進，亞洲和歐洲能扮演有效的角色：「當全球環境持續迫切要求它們以一種更具創造力的方式，以解決共同的行動問題，區域間經濟交往重要性的增強將更為清晰。事實上，全球化可以視為是新挑戰的始作俑者，需要國家、區域以及甚至區域間做出回應」。⁸

自從 1996 年「亞歐會議」（Asia Europe Meeting, ASEM）正式開始運作，補充了「現存最長的團體對團體對話之一」，⁹即 1972 年歐盟與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所建立的關係。亞歐會議是在 1990 年代對全球化更加認知後的產物之一：即發現「亞洲—歐洲—美洲」之間的三角關係中，亞洲與歐洲的關係是缺少的一環。認知全球化的跨學科性質，亞歐會議建立於政治、經濟與文化／人民與人民三根支柱之上。因此，現在似乎不再需要討論是否全球化的問題，因為以美國為主要動力的全球化態勢已經形成。現在的問題是如

Emerging Organizational Forms: The Proliferation of Regional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Greenwood Press, 1996), p.13; 以及 Cheryl Shanks, Harold Jacobson, and Jeffrey Kaplan, "Inertia and Change in the Constellation of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1981-1992,"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0 (Autumn 1996), p.593.

⁶ Ernst-Otto Czempiel, *Kluge Macht*. CH.Beck, Außenpolitik für das 21. Jahrhundert (München, 1999), p.156.

⁷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pp.23.

⁸ Julie Gilson,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Europe and East Asia," *Asia Europe Journal*, Vol.2, No.2, (January 2004), p.197.

⁹ Mathew Doidge, "Inter-regionalism and Regional Actors: The EU-ASEAN Example," in Stockhof, van der Velde and Yeo, eds., *The Eurasian Space: Far More Than Two Continents*. ISEAS, Singapore, 2004, p.39.

何「管理」或「治理」全球化，就歐洲而言，如何建立更緊密的歐洲經濟夥伴，歐洲如何使亞洲更多使用歐元作為儲備貨幣，歐洲如何使亞洲人能夠逐漸地接受歐洲對世界的貢獻。對亞洲而言，跟上和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符合各國的發展目標。因此，透過歐洲和亞洲的區域間互動經驗，得以說明「決定現今世界運作規則」的國際關係新現象。

貳、區域間主義的形式：實證觀點

擴大中的區域間關係網絡顯露在一種表現形式的寬鬆安排。為了對現存區域間的安排進行分類，三類不同的形式得以劃分之：區域集團之間的關係；雙區域（biregional）和跨區域（transregional）安排；混合諸如區域集團和重要單一國家之間關係。

一、區域集團之間的關係

歐盟傳統的集團與集團對話可以視為是區域間安排的原型，一種與「舊區域主義」（old regionalism）緊密連接的關係。該等對話關係自 1970 年代已經逐漸發展至涵蓋幾乎全部的世界區域。¹⁰一些觀點認為，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 EC）和東協之間長期的對話夥伴關係是一種集團與集團區域間主義（interregionalism）的模型。¹¹歐體是最先進的區域組織的既定事實，以及由於歐體的夥伴組織中區域間關係的缺乏，冷戰期間的區域間網絡似乎顯現一種「中心輻射型」（hub-and-spokes）體系，¹²圍繞歐體的吸引力而運作。由於集團與集團區域間主義中歐體具備的支配性地位，致使其遠非僅是一種透過「域外仿效」（extra-regional echoing）的方式影響其他區域的模型，尤有進者，歐體積極的利用區域間的關係作為一種手段，以促進對話夥伴間區域內的合作。¹³由於「新區域主義」（new regionalism）的出現以及冷戰的結束，集團與集團關係的全球網絡開展超越歐盟支配的「中心輻射型」體系。在世界上其他諸如拉丁美洲、東南亞和大洋洲的區域，區域集團開始在他們之間建立新型態的關係。東協成爲一項主要的動力支持該類發展，但諸如「南方共同市場」（Mercado Commun del Sur, Mercosur）和「澳紐緊密經貿關係」（Australia-New Zealand Closer Economic Relations,

¹⁰ Elfriede Regelsberger, "The dialogue of the EC/Twelve with other regional groups: a new European ident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Geoffrey Edwards and Elfriede Regelsberger, eds., *Europe's Global Links.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90), pp. 3-26.

¹¹ Manfred Mols, "Cooperation with ASEAN: A Success Story," in Geoffrey Edwards and Elfriede Regelsberger, eds., *Europe's Global Links.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90), pp.66-83; Andreas Lukas, "EC-ASEAN in the context of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in Guiseppe Schiavone, ed., *Western Europe and South-East Asia: Co-operation or Competition* (London: Macmillan, 1989), pp.105-116.

¹² 該術語是基於美國在亞太地區雙邊聯盟體系的背景下所創立。

¹³ Simon Nutall, "The Commission: protagonists of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in Geoffrey Edwards and Elfriede Regelsberger, eds., *Europe's Global Links.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90), p.146.

CER) 等其他的區域計畫安排，也開始與其他的區域集團建立關係。¹⁴該等關係通常多多少少是基於部長和資深官員層級的定期會議，而且創設聯合計劃和方案。他們通常全神貫注在資訊的交換以及在特定議題領域的合作，絕大部分在經濟範疇，通常是在貿易和投資。然而，在歐盟的案例中，集團與集團的關係總是包括諸如在人權和民主的對話政治的因素。在一些案例中，區域間的關係乃基於框架合作協定。¹⁵（參見表一）

¹⁴除了其與歐體 / 歐盟的傳統關係，現在東協雙邊集團與集團關係的網絡包括與澳紐緊密經貿關係協定、經濟合作組織、海灣合作理事會、南方共同市場、里約集團和南亞區域合作協會的聯繫。

¹⁵ 舉例而言，EU-ASEAN 1980, EU-Mercosur 1995.

表一：區域集團之間的關係

	歐洲	東亞	西南亞	北美	拉美	非洲	大洋洲
歐洲		歐盟與東協			歐盟與南方共同市場； 歐盟與安地諾共同體； 歐盟與里約集團； 歐盟與中美洲整合系統	歐盟與非南發展共同體	
東亞	東協與歐盟		東協與南亞區域合作協會； 東協與海灣合作理事會		東協與南方共同市場； 東協與里約集團		東協與澳紐緊密經貿關係協定； 東協與太平洋島國論壇
西南亞		南亞區域合作協會與東協； 海灣合作理事會與東協					
北美洲							
拉丁美洲	歐盟與南方共同市場； 歐盟與安地諾共同體； 歐盟與里約集團； 歐盟與中美洲整合系統	東協與南方共同市場； 東協與里約集團					南方共同市場與澳紐緊密經貿關係協定
非洲	歐盟與非南發展共同體						
大洋洲		澳紐緊密經貿關係協定與東協； 太平洋島國論壇與東協			澳紐緊密經貿關係協定與南方共同市場		

註：在相同區域中次區域集團之間的關係，諸如「南方共同市場」與「安地諾共同體」的聯繫並未在此處視為區域間關係而考慮。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二、雙區域和跨區域的安排

國際關係中，雙區域和跨區域的關係是一種較新的現象。該類區域間的安排浮現在嶄新的「三元群」(Triad)背景，¹⁶三個主要世界經濟區域之間的三角關係：

¹⁶ 「三元群」的概念源於美國、歐盟和日本之間的三邊關係，即世界三個經濟領導強權。概念逐漸成爲一種延伸至圍繞「三元群」地區（北美、西歐和東亞），其乃數項因素的結果：冷戰的結束、「新區域主義」出現以及東亞浮現爲世界經濟的第三個中心。由於在 1990 年代「三元群」區域之間區域間關係的建立而進一步強化。在 1990 年代中期，新「三元群」概念成爲對新興國際秩序論述的一項主要特徵。Heiner Hänggi, “ASE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Triad,”

北美、西歐和東亞，但該現象近年已經散播至世界其他地區。該等相當異質會員身分的安排中，較在傳統集團與集團的對話是更加的擴散；其不必然與區域的集團相一致，而且可能包括來自超過兩個區域的成員國。因此，各國參加一個個體有資格的區域，儘管有時或許有某些程度的區域協調。¹⁷

迄目前為止，五個雙區域或跨區域的聯繫已在美洲、歐洲、東亞、大洋洲和非洲之間所建立：1989年創始的「亞太經合會」(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是一種跨區域的安排，包括廿一個太平洋邊緣國家，尤其是十五個東亞經濟體，三個北美洲和兩個南美洲國家(智利和秘魯)；1996年創始的「亞歐會議」是一種雙區域的安排，包括十個東協國家、廿五個歐盟的成員國以及東北亞三國和歐盟執委會共卅九方；1999年6月舉行的「歐洲與拉美里約高峰會」是一種雙區域的努力，聯繫卅三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國家與十五個歐盟成員國；2000年4月舉行的「非洲與歐洲開羅高峰會」(Africa-Europe Cairo Summit)也是一種雙區域的努力，聯繫十五個歐盟成員國與五十二個非洲國家，「非洲團結組織」(Organization for African Unity, OAU)的所有成員國，摩洛哥除外；「東亞與拉丁美洲論壇」(East Asia-Latin America Forum, EALAF)於2001年正式成立，是一種跨區域的安排，包括十三個東亞國家和澳洲/紐西蘭以及十二個拉丁美洲國家。(參見表二)

由歐盟代表的歐洲、拉美和東亞皆被三個雙區域或跨區域的安排所涵蓋。該等相對大規模的安排，或多或少是基於定期的高層級會議(高峰會和部長會議)以及一些聯合的計畫和方案。迄今為止，「亞太經合會」已發展出一個審慎的基礎設施(在新加坡一個小的秘書處)，是各類中唯一具有該類的安排。全部該等計畫的共同之處在於它們的議程集中於經濟議題，但該等計畫之中包括歐盟成員國通常跟隨一種三方面途徑，亦即其亦包括政治對話以及在其他諸如社會與文化和發展合作領域的合作。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Vol.4, No.1, (1999), pp.56-80.

¹⁷ Jürgen Rüländ, "The EU as Inter-Regional Actor: The Asia-Europe Meeting (ASEM)," Paper Prepar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sia-Europe on the Eve of the 21st Century," Bangkok, 19-20 August 1999, p.2.

表二：雙區域和跨區域的安排

	歐洲	東亞	西南亞	北美	拉美	非洲	大洋洲
歐洲		亞歐會議		跨大西洋自由貿易協定？	歐洲與拉美高峰會	非洲與歐洲高峰會	
東亞	亞歐會議			亞太經合會	東亞與拉丁美洲論壇（亞太經合會）		（亞太經合會）
西南亞							
北美	跨大西洋自由貿易協定？	亞太經合會			美洲自由貿易區？		（亞太經合會）
拉美	歐洲與拉美高峰會	東亞與拉丁美洲論壇（亞太經合會）		美洲自由貿易區？			（亞太經合會）
非洲	非洲與歐洲高峰會						
大洋洲		（亞太經合會）		（亞太經合會）	（亞太經合會）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三、區域集團和單一強權之間的關係

最後，在世界其他地區的區域集團和單一大國之間的關係。該等關係是混合而成的形式，其中尤其適用在區域間關係中在其自己的區域擁有支配地位的單一大國（例如北美洲的美國；南亞的印度）。尤有進者，區域集團和單一強權之間的關係或許構成雙區域或跨區域的安排（例如歐盟與中國 / 歐盟與日本和「亞歐會議」）的重要成分之一。歐盟和東協是最合適的區域間集團，其中有一種與單一大國外部關係的傳統。歐盟和美國之間的關係構成全球區域間網絡的一項重要成分。（參見表三）

表三：區域集團與單一國家之間的關係

	歐洲	東亞	西南亞	北美	拉美	非洲	大洋洲
歐洲	歐盟與俄羅斯	歐盟與中國； 歐盟與日本； 歐盟與韓國； 東協與俄羅斯	歐盟與印度	歐盟與美國； 歐盟與加拿大； 歐洲自由貿易協會與加拿大	歐盟與墨西哥； 歐盟與智利； 歐洲自由貿易協會與墨西哥		
東亞	歐盟與中國； 歐盟與日本； 歐盟與韓國； 東協與俄羅斯	東協與中國； 東協與日本； 東協與韓國	東協與印度； (東協與巴基斯坦)	東協與美國； 東協與加拿大			東協與澳洲； 東協與紐西蘭
西南亞	歐盟與印度	東協與印度； (東協與巴基斯坦)					
北美		東協與美國； 東協與加拿大					
拉美	歐盟與墨西哥； 歐盟與智利； 歐洲自由貿易協會與墨西哥						
非洲							
大洋洲		東協與澳洲； 東協與紐西蘭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參、區域身分的形成：東亞整合的緩慢進程

歐盟認知亞洲在政治、經濟、文化、宗教、歷史和地理的差異，在首次在 1994 年出版的《新亞洲戰略》(Towards a New Asia strategy) 中詳加說明，¹⁸並在 2001 年更新。¹⁹因此，其乃為與東南亞一種特別的夥伴關係，在 2003 年發展一種

¹⁸ 1994 年 7 月 13 日，歐盟委員會 (La Commission, The Commission) 起草一份重要文件，題為《通向亞洲新戰略》。1994 年 11 月 28 日，歐盟執委會 (Le Conseil, The Council) 認可該文件，正式通過《歐洲聯盟的亞洲戰略》報告，並在 12 月的歐盟高峰會議獲得批准。該戰略報告的提出，是因為「亞洲和歐洲發生的巨大變化要求歐洲給予亞洲新的優先地位，對亞洲國家採取更加積極和堅定的政策」，是因為「歐盟和亞洲之間在經濟方面的互賴有所加強。歐洲如果企圖保持其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它就必須迎接來自亞洲並在亞洲地區也在進行的經濟挑戰。」關於戰略目標，歐盟在該戰略報告中提及兩層意義。一層是長遠性、全球性的，亦即「維護世界和平，保持對外政策和安全政策的穩定，維護開放的世界貿易體系；支持永續發展，使發展中國家逐步順利地進入世界經濟範疇之中；反對貧困，推進民主和基於法制國家的結構，尊重在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維也納宣言及其行動綱領基礎上的人權。該等目標和基本原則構成歐盟和第三世界國家之間關係的重要因素。」顯然，該層意義與歐盟的全球戰略目標一致，換言之，歐盟已經將其「亞洲戰略」納入其「全球戰略」實施。另一層意義是現實性、區域性的，亦即報告反覆強調歐洲在亞洲的「存在」，尤其是強調「歐洲在亞洲的經濟存在」，換言之，歐盟強烈希望能以一個整體的新形象回到亞洲，從而躋身於世界多極化的有力、有利地位。
<http://europa.eu.int/comm/external_relations/asem/asem_process/com94.htm#0>

¹⁹ 2001 年 9 月，歐盟委員會再度發表一份關於歐盟對亞洲新戰略的文件《歐盟與亞洲：歐盟委員會通過加強夥伴關係的新戰略》。該文件是對 1994 年歐盟發布《走向亞洲新戰略》文件的充實和發展，它詳細闡述今後十年歐盟與亞洲關係的戰略新框架，旨在將歐盟在亞洲的存在提高一個與擴大後的歐盟在全球的地位相稱的水準。該項戰略的重點是：加強歐盟在政治和安全領

特殊的戰略的合適結果。²⁰

此類差異的認識已經指導在 1996 年亞歐會議的創始人。亞洲的參與者預見兩類的亞洲夥伴國，一個代表當時七個東協國家，另一個代表東北亞的夥伴，即其後建立的東協加三中的「加三」。在次區域的脈絡下，儘管在一種低層次的整合，東協成員發展出一種明確合作和協調的文化，即所謂「東協模式」(ASEAN way)，²¹以確保行動唯一的一致基礎，並且對內部事務的不干預。自從 1999 年東協馬尼拉高峰會後，一些十分謹慎的努力以軟化該限制東協解決問題能力的原則。由於亞洲金融危機後導致長期執政的印尼總統蘇哈托 (Suharto) 下台，印尼作為東協領導者的角色因而暫告消失，泰國試圖填補當時權力的真空，建立所謂「曼谷進程」(Bangkok process)，以促進或加速在緬甸的民主改革。雖然「曼谷進程」是一項泰國且非東協的倡議，而且進程並不是太成功，但其意義在於顯示東南亞國家逐漸察覺到需要增進區域問題解決的能力。

前東協秘書長塞貝里諾 (Rodolfo Severino) 是一位對東協內部事務消息靈通的專家，他意識到冷漠的東協模式在其歷史上有重大意義的脈絡價值，但提醒東協領導人們適應廿一世紀的現實，因為「經由非正式和迴避法治主義 (legalism)、務實主義和靈活性、國家主權和不干預，以及會員地位的平等，致使『東協模式』曾經有效，甚至在廿世紀對東協不可或缺，而且實質上該類作法仍將有效。然而，如果在廿一世紀東協希望持續有所意義和有效，必須修改及調整該等作法的適用性。」²²他認為最重要的補救之道是，軟化不干預的原則（「對於它們疆界之外正遭受虐待或壓迫或被察覺將被虐待或壓制的人們伸出援手」²³）以適應歐盟的外交政策目標。他邀請東協「採納由所有成員可以接受的明確行為規範，而且其中政府能被要求負責。」「該等規範或許可以宣告該等諸如酷刑、最惡劣的童工處境、虐待婦女和兒童，利用強暴作為戰爭或國家權力的工具、藉由軍事力量推翻合法的政府，以性別、種族、語言、文化或宗教為理由的歧視是無法接受的野蠻行徑。」²⁴

儘管三個東北亞國家中國、日本與南韓有歷史仇恨，但新的原因產生新的利基，學習協調他們自己在該等諸如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知識份子和人民與人民事務互異和敏感的領域是如何在緩慢的進展中運作。當面對歐洲的伙伴國時，東南亞和東北亞的觀點必須合併為一種亞洲的觀點，對於鍛造東亞區域身分

域與亞洲的接觸；加強歐盟與亞洲的雙向貿易和投資關係；有效幫助減少亞洲的貧苦；幫助促進民主、良好的管理和法治在亞洲各地的傳播；與亞洲主要的夥伴建立全球夥伴關係；進一步促進歐亞兩個地區的相互瞭解。為此，該文件還擬定加強歐盟與亞洲關係的具體建議。該文件賦予亞歐合作深刻的內涵，表明亞歐兩大洲在 21 世紀的合作潛力巨大、前景廣闊。

<http://europa.eu.int/comm/external_relations/asia/doc/com01_469_en.pdf>

²⁰ <http://europa.eu.int/comm/external_relations/asia/doc/com03_sea.pdf>

²¹ Alistair Johnston, "Socia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he ASEAN Wa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Ikenberry and Mastanduno,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07-162.

²² Rodolfo Severino, "Will there be a New ASEAN in the 21st Century?" *Asia Europe Journal* (2004)2; p.184.

²³ Ibid, p.183.

²⁴ Ibid, pp.183-84.

和亞洲夥伴國之中信心建立是重要的貢獻。因此，問題仍在於東亞各國仍互相抱持甚大的猜疑，²⁵因為軍國歷史，日本被其他亞洲國家（尤其是中韓）所質疑，²⁶中國作為新興的經濟強權，其最終的目的究竟是區域的合作還是支配，迄今仍不清楚。

就區域主義而言，由歐盟所代表的歐洲已建立十分完善，而且區域化程度甚高，但兩個亞洲的區域（東南亞和東北亞）遠能所逮。雖然過去數年東協已開展出一種凝聚的明確程度，而且能夠信賴東協秘書處的運作，但東協在 1997 年擴大已經事實上導致一種東協七加三，它們不僅在經濟上有極大的差別，而且三個新成員的政治條件也仍不足。²⁷（東協高峰會已經設計出不同的倡議以促進凝聚）。東北亞是更遠離社會化進程的一個區域，但近年來獲得部分動能。雖然羅德明（Lowell Dittmer）關於東北亞是否具有所有的要素以符合作為一個區域的資格仍心存懷疑，²⁸他推斷，東北亞「乃一個區域，發現本身仍在邁向制度區域化長征的初期階段…浮現為世界的發動機，包含包括它的最為先進的經濟體以及它的最大和發展最迅速的經濟。」²⁹

因此，在亞洲方面，亞歐會議促成東協加三的形成，經由上述所提由東南亞和東北亞夥伴行使的「雙重協調關係」（double coordinatorship）所倡議的學習進程。儘管遭遇相當大的困難，但是畢竟亞洲的夥伴國能在困難的政治議題鍛造一種一致的亞洲觀點；在一些情況下，亞洲的夥伴國必須滿足他們自身目前的不同觀點，將決策留給全體出席的會議的動能。儘管該程序並非最具效率的一項，亞洲資深官員在準備亞歐會議的會前會，促成區域身分的建立以及強化兩個東亞團體間的團結。

在歐盟方面，亞歐會議的全面性質係建立在三根支柱之上，從而挑戰歐盟進一步發展一種共同的亞洲戰略，基於 1994 年的《新亞洲戰略》。作為亞歐會議高峰會的準備，歐洲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 EC）出版政策文件³⁰稱為「執委會幕僚工作論文」（Commission staff working papers）以協助歐盟會員國的準備工作；由於該等文件是在公共領域發表，因此亞洲的亞歐會議夥伴國亦能一窺其中的運作而獲益。

²⁵ Samuel Kim, "Northeast Asia in the Local-Regional-Global Nexus: Multiple Challenges and Contending Explanations," in Kim, e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Northeast Asia*, Rowman&Littlefield, 2004, pp.45-51.

²⁶ 2004 年 4 月 7 日，福岡地方法院作出里程碑的判決，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在 2001 年 8 月參拜與戰犯有關的東京靖國神社是違憲之舉，因為其違反了政教分離可能在日本的外交政策引發強烈的反彈。"Koizumi Shrine Visit Ruled Unconstitutional," *Japan Times*, April 8, 2004, p.1.

²⁷ 舉例而言，2003 年 1 月，據報導泰國著名女演員蘇瓦南·貢英發表演論要求將吳哥窟交還泰國，雖然她本人否認會說過任何類似言論，但**柬埔寨示威者縱火燒毀泰國駐金邊的大使館，泰國宣佈召回駐柬埔寨大使，致使兩國關係陷入低谷**。為了恢復兩國人民之間的瞭解，兩國建立「泰國與柬埔寨文化協會」（Thailand Cambodia Cultural Association），參見 *Bangkok Post*, March 24, 2004, p.6.

²⁸ Lowell Dittmer, "The Emerging Northeast Asian Regional Order," in Kim, ed., *op.cit.*, p.331.

²⁹ *Ibid.*, p.360.

³⁰ 參見作為第四屆亞歐會議高峰會所準備的幕僚工作論文 "Unity and Strength in Diversity," <http://europa.eu.int/comm/external_relations/asem/asem_summits/asem4/sec02_en.pdf>

因此，不僅亞洲的國家面對來自其傳統的工作方法的挑戰，而且歐盟也面對不同於三根歐盟支柱的方式挑戰，因為其不同於亞歐會議的三根支柱。因此，歐盟主席（Presidency）和歐洲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在所有三項領域的雙重協力角色，包括政治與文化議題，需要務實主義。此務實的挑戰變得更加激烈，當一項事件的東道主與歐盟中主席意見不一時，其產生主席職位不穩定的問題（諸如在柏林舉行的亞歐經濟部長會議係由輪值主席芬蘭總統所主持）。歐洲委員會的角色作為唯一固定的亞歐會議協調者，由亞歐會議夥伴國創立一個可接受的制度的優勢，而且允許委員會成為進程中一股驅使力量，並且不僅像是秘書處，而且其通常作為制度的經驗傳承（institutional memory）並且提供指導。歐洲執委會發展出一個全面性的網站，³¹其也發揮作為一個大眾對進程類似檔案的功能。

總之，亞歐會議促成區域間認同的建立，主要但明顯不僅在經濟領域誠如吉爾森（Julie Gilson）似乎意謂。「歐盟和東亞之間增長的經濟對話現在賦予它們共同討論的新語言，而且作為一項後果，一種對於亞洲的夥伴國更為結合的身分。亞洲的亞歐會議國家在國際經濟制度中的集體參與，包括亞歐會議，而且一種區域內亞洲國家逐漸增加的聯繫網絡確保更大的認知區域作為一個結合的經濟實體。」³²

肆、區域間主義與新區域主義：互為強化的新趨勢

區域間主義的研究強調，區域之間的互動會直接影響涉入在內的行動者。經由互動，每一個區域的明確（特）性從而凸顯出來，致使它們進一步的發展，以及各區域的身分建立，似乎是「透過區域間主義促進區域主義」的意味。³³另外，「區域行為者逐漸增加的數目，引起連接全球和區域制度媒介物的需要，以及在（國際體系的較低部分）區域和國家政策的制定層次。」適用到東亞，吉爾森認為，³⁴「透過一種功能結構的提供，亞歐會議已促成邁向『東亞』區域的自我身分，從而為集體行為的新形式提出一種認知背景。」建構主義者認為，亞歐會議引導亞洲的區域，「現代史的首次，亞洲正浮現為一個不同於其他的區域國家體系，一個強大、繁榮、獨立國家的群聚，相互密集和持續地處理在外交、戰略和經濟事務。」³⁵

面對全球化逐漸的複雜性，傳統雙邊關係浮現缺漏，區域間主義或許可以部

³¹ <http://europa.eu.int/comm/external_relations/asem/intro/index.htm>

³² Gilson,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Europe and East Asia," *op. cit.*, p.197.

³³ Jürgen Rüländ, Inter-and Transregionalism: Remarks on the State of the Art of a New Research Agenda. National Europe Centre Paper no. 35 prepared for the Workshop on Asia Pacific Studies in Australia and Europe: A Research Agenda for the Futur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5-6 July 2002. <<http://www.anu.edu.au/NEC/ruland2.pdf>>

³⁴ Julie Gilson, "Defining Inter-Regionalism: The Asia-Europe Meeting (ASEM)," SEAS Electronic Working Papers, Vol.1, No.1, SEAS Website, 24 April 2002. <<http://www.seas.ac.uk/Research/SEWP/Vol1/Gilson.pdf>>

³⁵ Aaron Friedberg, "Will Europe's past be Asia's Future?" *Survival*, Vol.42, No.3 (Autumn 2000), p.147.

分的補充。需要對於一種靈活、務實、功能主義者，程序的途徑解釋（非）區域間主義者對話特殊的制度設計，諸如亞歐會議，意謂主要成爲一種對話論壇。吉爾森稱其爲「關係的群聚」，不但涉及兩個「建立在一系列不同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歷史」區域，而且「有明顯的區別且在許多方面沒有集體特徵的見解。」³⁶丹特（Christopher Dent）認爲，亞歐會議爲一種「跨區域」（trans-regional）而非「區域間」（interregional）進程，原因在於「區域之間和跨越區域共同『空間』的建立，其中組成的代理人…運作而且互相有緊密的聯合（associative）關係。」互動的四個主要空間確認為經濟、商業、政治及社會文化空間。³⁷羅藍（Jürgen Rüländ）對照亞歐會議爲一種具有「區域間對話」的「跨區域的論壇」（transregional forum），其乃「沒有共同支配一切制度的團體對團體對話」。在他看來「跨區域的論壇」較區域間的論壇「有一種更爲擴散的會員成分」。他們發展「透過共同雖然鬆散的制度…若干獨立主體性的外形致使它們與團體對團體的對話有所區別。」³⁸

「新區域主義」有助於說明亞歐會議的一些特色。對阿姆斯壯（David Armstrong）、羅意德（Lorna Lloyd）和雷德蒙（John Redmond）而言，新區域主義「是一種在三項不同但有相互關係方式的對全球化的回應」：防禦，保護當地文化和企業；競爭，爲全球競爭提供一個安全的基礎以提高議價實力；結構，傳統的社會主義者和「第三世界主義者」（Third Worldist）意識型態強調國家管理和自立更生的消逝後，促進調整措施以實踐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必要條件。³⁹根據布列斯林（Shaun Breslin）和黑格特（Richard Higgott）的觀點，大部分亞歐會議夥伴國致力於任何許多重疊的區域努力，而沒有察覺在該進程中或許會出現矛盾。⁴⁰在歐洲方面適用於許多區域間的安排，在亞洲方面「亞太經合會」和「東亞與拉美合作論壇」（Forum for East Asia-Latin American Cooperation, FEALAC）引人注目。在亞歐會議利害所設各方亦由布列斯林和黑格特描寫爲「國家行爲者、國家間和全球制度以及非國家行爲者（尤其是跨國公司、新興的公民社會組織以及非政府組織）的複合雞尾酒所構成，全部皆會對區域的結果產生影響。」⁴¹

區域間主義的接觸也透過一種不斷「一系列共享的認知、規範以及司法的假定」的反覆進行，形塑其組成部分的真正特性。⁴²類似於國際體系中的國家，區域之間的互動導致建構身分，透過彼此的承認、參照和重申。該情形可能最終導致新行爲者的出現，如同亞歐會議顯示的實例。東協尤其是盛產區域內和區域間的文本：其分別創建「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東協加

³⁶ Julie Gilson, *Asia Meets Europe, Inter-Regionalism and the Asia-Europe Meeting*,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2, p.11.

³⁷ Christopher Dent, "From Inter-regionalism to Trans-regionalism? Future Challenges for ASEM," *Asia Europe Journal* (2003)1; pp.224, 232.

³⁸ Rüländ. *Inter-and Transregionalsim*.

³⁹ Armstrong/Llyod/Redmo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World Politics*, 3rd edi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214.

⁴⁰ Shaun Breslin and Richard Higgott, "New Regionalism(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sia Europe Journal*, Vol.1, No.2 (May 2003), p.173.

⁴¹ *Ibid.*, p.180.

⁴² Gilson, *Asia Meets Europe*, p.11.

三」和「亞歐會議」。在形塑東南亞地區，阿齊亞（Amitay Acharya）歸因於外部的影響為一項重要的角色：「雖然在冷戰期間東南亞被承認為一個政治地區是目前全球地緣政治和外部感覺和影響的結果，但名副其實和持久的認知僅能從東南亞的區域主義者致力於管理區域的衝突（諸如柬埔寨衝突）過程中，並且經由外部的權力尋找共同的立場。」⁴³

慮及該等亞歐會議的具體性，致力於一種折衷的方式說明亞歐會議應為可行，結合諸如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功能主義、建制理論以及務實主義國際關係不同理論的要素。

從現實主義者的觀點分析，亞洲與歐盟交往起初是對美國的經濟影響抵銷措施的第一步，後者透過雙邊以及亞太經合會進行影響力施展。然而，亞歐會議僅能視為是一種增加軟權力的手段。亞洲和歐洲的亞歐會議夥伴之間的國家利益並非由權力平衡的考慮所支配，而更接近一種對經濟發展的共享利益。因此，當它們在各自的區域不是直接的政治競爭者時，它們產生合作的興趣與利益。因為國家是理性的行為者，如果能對它們的利益極大化的提供，並且有利於它們長期的利益，它們將致力於合作。舉例而言，儘管中國自身是亞歐會議的發起國之一，但中國多邊的交往已成為亞歐會議夥伴國的長期利益，從而成為亞歐會議的另一項重要特徵。透過參加不同的國際論壇（亞歐會議、亞太經合會、上海合作組織、東協加三、博鰲論壇、圖們江流域開發計畫、大湄公河計畫等），以分享中國「平等參與」的利益，北京則想要「減輕包括東北亞和東南亞鄰國之間對中國造成經濟威脅（或一種政治或安全威脅）的關注。」⁴⁴

就自由制度主義者的觀點而言，僅僅是兩造或多方之間存在共享的利益，並不必然導向合作。基歐漢強調，為了達到所有人可以接受的結果，合作需要積極的企圖，以調整該國政策；⁴⁵同時，該等行為並非必然排除國家之間的衝突。在上述提及國際論壇的中國參與，似乎符合此條件的假設，尤其是當一國慮及中國致力於達到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以及中國在亞洲的金融危機期間負責任的貨幣政策。

亞歐會議對經濟關注可追溯至亞歐會議在 1990 年代初期成立的原因，在東南亞經濟發展的全盛時期，尤其是「小虎」，由出口引導成長的政策所驅使，對於穩定的範圍擴大至東北亞和歐洲是具有利害的關係；對北美洲區域間的連結已由亞太經合會所建立。歐盟作為一個經濟而非作為一個軍事行為者，是一方面是較大類似東協國家的立場，而且在另一方面又類似於日本的立場。

因此，亞歐會議在自由主義理論下為國家之間積極的互動提供一個論壇。自由主義者的思維是基於實現和平以及逐漸增加的經濟互賴相互增進影響的假設，民主的擴展和國際制度重要性的增強。就亞洲的觀點而言，共同利益在經濟

⁴³ Amitay Acharya, *The Quest for Identity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Southeast A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67.

⁴⁴ Thomas Moore,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Economic Dimension," in Kim, ed., op. cit., p.117.

⁴⁵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51-52.

支柱是最強的。經由政治和官僚菁英的信心建立被視為是第一重要步驟，尤其在第一項（政治的）支柱，合作之前應擴大至「社會的所有部門」。歐洲人傾向強調，所有三根支柱擁有相同的重要性與價值，反映一種平等的夥伴關係。雖然該論證概念上是正確的，但其無法掩蓋經濟考慮立於進程支架的事實。自由主義者將認識到經濟互賴成為國際合作的動機，儘管現實主義者將經濟評價為權力或（在新現實主義者的觀點）國際結構的重要決定因素之一。

不同於現實主義者理論，在 1990 年代亞歐會議的創始，不是基於國家致力於克服它們的不安全，而是亞洲和歐洲對經濟福祉的立場和相對的政治穩定。新亞歐會議關係在 1997 至 1998 年亞洲金融危機必須非常迅速地經得起考驗。國家利益界定在經濟穩定之上，在一種全球互賴的世界經濟中培育區域間合作的利益，其然後在政治和人與人 / 文化範疇中產生副作用，由歐洲的一方所預期，但只是亞洲的夥伴國不願意接受。〔該種不情願在更新亞歐合作框架（Asia-Europe Cooperation Framework, AECF）的過程中十分顯著，在漢城高峰會時接受 2000 年版亞歐合作框架〕。

亞歐會議並不符合現實主義的另一要素：其不是建立在國家為單一的行為者，當其包括在其經濟支柱中的非國家行為者〔除了「亞歐工商論壇」(Asia Europe Business Forum)，在「亞歐投資促進行動計劃」(Investment Promotion Action Plan) 背景下，資深官員會議和亞歐會議經濟部長的會議工作層級會議中的商業代表〕以及在第三根支柱。

該概念再一次明確地係主要由歐洲的行為者所接受；儘管在經濟的支柱有一些支持（新加坡和某種程度的日本），但在第三根支柱是相當的不情願。舉例而言，2000 年，亞洲的伙伴國並不願意接受包含「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 一詞在「亞歐合作框架」2000 年的更新版，除了因為編輯上的失察在一處之外，⁴⁶但最後勉強接受「社會的所有部門」。然而，因為涉及外交政策制定利害關係人的過多，因此該類廣泛的途徑是與所有行為者追求多樣性的國家利益一致。就該方面而言，利德藍 (Dato Deva Mohamed Ridzam) 表達的觀點標誌一項受歡迎的發展，「若結成特別關係事實上是亞歐會議『難以明言』非常核心的目的，則其乃肯定的重要，亞歐會議伙伴國達致公民社會的成員，其扮演可稱為亞歐信息 (message) 多元分享者 (multipliers) 的角色，當倡議和計畫盡可能拉近兩地區基層民眾涉入的社會和民族，結為歐 / 亞的大陸兩個地區之間特別關係方可能有意義，結成特別關係是目的、目標，雖然亞歐會議僅是一種工具。」⁴⁷此乃一項逐步接受亞歐會議並非設計為一種僅限於經濟議題單一議題的合作框架的信號。

伍、區域建制形成與制度建立：國際建制與國際制度的理論實踐

⁴⁶ Art.25, 4th indent AECF 2000.

⁴⁷ Dato Deva Mohamed Ridzam, "ASEM and Civil Society: Need for new dynamic," *Bulletin of the European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Vol. 7 #10&11, Oct.-Nov. 2003, pp.3, 5.

對國際建制的形成過程而言，⁴⁸亞歐會議是一個不錯的研究案例，亦即經由區域間的對話最終似乎促進制度的建立。從一開始，「亞歐合作框架」(Asia Europe Cooperation Framework, AECF)即提供建制進程的結構和規則。伙伴國承諾在該議定的框架中展開對話，確保全部參與者在不同的層級參加外交議程的會議。該項規則性，尤其是每兩年的高峰會，以及三根支柱確保一種廣泛互動的廣度和深度，而無法由特別會議或在其他邊緣事件會議所能比擬。2000年更新版本的「亞歐合作框架」以及其他由亞歐會議外交部長議定的行政措施，得以管理進程和建立品質管理措施為目的，以增加效率。當亞歐會議夥伴國數目在河內高峰會(2004年10月8至9日)從廿六個增加至卅八個，⁴⁹需要更有效率的管理進程，以避免發言過多而行動過少，從而最終將危及進程。因為許多國家的提議，將重新討論該進程是否應成為正式的制度化創建一個秘書處。

亞歐會議實踐顯示，原則上夥伴國期待其他的夥伴國透過規則(穩定的作用)行事，儘管它們準備好忽略它們的一致同意的基礎。然而，規則的主要部分寫在2000年「亞歐合作框架」，亞歐會議的工作方法不同的後續行動協定以及引導亞歐會議事務的實際運作，當夥伴國的預期沒有辦法在亞歐會議的三根支柱取得相同的認知強度，僅能透過特殊的四個協調者，提供充分的要素以授與亞歐會議作為一種部分的建制或是一個在「原初狀態」(statu nascendi)的建制。只要亞歐會議不是正式的制度化或是由其自己的行政組織(秘書處)所協助，它的進一步的發展似乎將依賴務實的功能主義，其反過來可能促成建制建立過程的強化。⁵⁰在亞歐會議河內高峰會主席聲明中，領導人們在重申目前非正式的結構同時，明確在政治上遵守制度化的議程，「他們派給外交部長們和資深官員一項任務，即研究亞歐會議制度的機制持續的改進，並且提出他們的建議，基於它們在第五屆亞歐會議高峰會中表達的理念，包括在適當的時機推動亞歐會議秘書處的可能性，以及未來會員擴大的問題。」⁵¹

在開始的階段，區域間對話需要一種更為靈活、務實、功能主義者操作的方法。特別的非制度設計作為一種法律上鬆散的對話論壇、一種關係的叢集，讓參與者熟悉來自另一區域的伙伴國，允許一段磨合的期間，而且一種相對迅速的開始(或若有需要原地踏步)，當伴隨一個國際組織的創建所有的正式手續和法律上的必要條件得以避免。

⁴⁸ 如同一般學界的立場，本文還是採取克萊斯納對建制的定義，「在某一特定的國際關係領域中，各行為者的期望得以彙集在一起的一系列明確的或暗含的原則、規範、規則和決策程序」十分符合2000年版「亞歐合作框架」。Stephen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6, No.2, (1982), p.186.以國際建制分析歐盟適當性的評估，參見 Robert Breckinridge, "Reassessing Regimes: The International Regime Aspects of the European Un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35, No.2 (1997), pp.173-187.

⁴⁹ 2004年5月1日，十個新歐盟成員國加入歐盟以及三個缺席的東協成員柬埔寨、寮國、緬甸獲准參加在河內舉行的第五屆亞歐會議高峰會。

⁵⁰ Michael Reiterer, "ASEM: Value Added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o the Asia-Europe Relationship," *The Eurasian Space*, op.cit., p.17.

⁵¹ <http://www.asem5.gov.vn/detail_new.asp?id=209&langid=2&menuid=87&curentmenuid=87>

亞歐會議將從進一步形塑渠自己的身分而獲益，而且變得更加積極的參與發展中的全球治理的形式，尤其是在渠等貿易、經濟和財政事務、社會治理的領域，而且還延伸至安全。⁵²雖然相對於作為一個「正式的」制度期望為低，但亞歐會議在一種相當結構性方式為對話和商議提供一種論壇，並且在進程中創立一些普遍性的行為原則，而且充分的實踐或許會導致「亞歐會議習慣」或「亞歐會議主體性」(ASEMness)。⁵³來自歐盟、中國、越南和寮國的代表參加河內高峰會，代表官方完全不同的經濟制度，可能在「對市場經濟的承諾、各國政府和企業之間更緊密的合作、非歧視的自由化和區域主義、遵守世貿規則、互相尊重和平等的夥伴關係，認知亞洲和歐洲的範圍內和之間經濟上的差異」取得一致的意見。⁵⁴

如果亞歐會議未來想要增加其在國際關係中的主體性 (actorness) 並且成爲一個國際組織，其後可以成爲一個獨立的行為者，以建立與其他像是南亞區域合作協會 (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SAARC)、上海合作組織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亞太經合會或其他組織的聯繫。此將促成一種跨區域組織相互作用網絡的發展，以回應一種政治上的需要，成爲一種新區域主義的產物。該類新區域主義的特性是「較少的國家中心，更大意識到進程中政治進程以及非國家行為者角色的重要性，並且某種程度認識到一種區域的構想既是社會的建構又是符合經濟上的決定論」。⁵⁵發展中的獨立主體性，該等區域間和區域內組織可以促進未來的外交行為，不僅在減少參與者的數目，而且需要透過代表各區域召開許多會議。雅普斯 (De Prado Yepes) 詳細說明該類潛在的新功能，他稱爲「亞歐會議外部的區域主義」(ASEM-Extra-regionalism)。⁵⁶

陸、結論：亞歐會議對亞洲和歐洲國家的含意

就某種程度而言，亞洲還停留在歐洲的 19 世紀。發展的不對稱性致使亞歐之間的合作前景並非十分光明。儘管如此，建立多邊區域主義機制仍有其可行性，該類可能性需要同時運用權力平衡和整合理論。在區域化的問題上，歐洲提供模式，亞洲得到益處，現在需要討論具體的實施措施。歐洲區域化的具體措施是和平、團結、共同價值和區域認同、經濟整合的擴展以及用一個聲音說話。東亞則是解決衝突，允許更大的多樣性，信守民族和發展的價值，但是在經濟和政治整合方面還難以做到像歐洲一樣，原因部分是因為缺少互信、相互猜疑、還有不同的優先目標。但重點在於，對於亞洲未來發展的走向，歐洲人表現極大的關

⁵² Michael Reiterer, *Asia Europe: Do They Meet? Reflections on the Asia-Europe Meeting (ASEM)*. World Scientific/ASEF, Singapore, 2002; pp. 118-119. Heiner Hänggi, "ASEM's Security Agenda Revisited," in *The Eurasian Space*, op.cit., pp.93-118.

⁵³ Reiterer, "ASEM: Value Added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o the Asia-Europe Relationship," *The Eurasian Space*, op. cit., p.20.

⁵⁴ Hanoi Declaration on Closer ASEM Economic Partnership. <http://www.asem5.gov.vn/detail_new.asp?id=210&langid=2&menuid=87&curentmenuid=87>

⁵⁵ Breslin and Higgott, op.cit., p.181.

⁵⁶ Cesar de Prado Yepes, "ASEM's Extra-regionalism: Converging Europe's and East Asia's External Projections towards Other Regions," in *The Eurasian Space*, op.cit., pp.58-74.

切。

論及區域建設時，一般而言皆會特別強調「領導」的問題，強調由誰主導何種程序？使用何種價值？如何提供服務？在那些方面進行建制化建設等問題。新加坡和法國已經引領而出，亞歐會議北到朝鮮，南到緬甸，討論的問題差之千里，區域內又有區域，歐盟能產生何類作用？好的對話機制包括三根支柱：政治支柱

沒有機制化，經濟支柱類似於亞太經合會，只有文化支柱對於歐盟而言是比較容易管理的，因為已經機制化為「亞歐基金會」。因此，挑戰在於區域建設和對話沒有協調者，沒有領導（有人提出只有中國方可能擔任領導腳色，但是中國又不會為之）。多邊主義的作用在於建立多邊世界，但與美國的單邊主義相對照，它是被動而不是主動的。

關於東協的建設，東協的唯一條件就是政治和解，沒有任何的秩序、結構、法律，而是領導人之間的認同，此即亞洲價值觀。其次，泰國提出「靈活融入」、坦率討論，甚至可以涉及國內問題。論及經濟整合的困難時，亞洲國家在引進法律、規則時總是留有餘地，一個部門一個部門地進行，因為有外來的壓力，有中國的競爭，方逐步地擴展「自由貿易區」，但還是允許十國有不同的效率。只有貿易、投資的壓力方促使東協產生合作的文化。其結果是每個國家都在變化，都在逐漸地變化。東亞要發展共同的認同感（特性），而認同感的建立要透過共同體建設，共同行動和人民與人民之間的互動。

迄今為止，歐盟仍努力建立區域共同體，不僅是建立區域共同體，而且是用「歐洲經驗」和「歐洲模式」，漸進地為亞洲的區域化作出貢獻，影響亞洲的區域建設。強調在亞洲和歐洲之間應建立「制度化」的關係，在亞洲區域內進行「制度化」建設，使得一些諸如毒品、犯罪、移民等問題，可以納入法制化的軌道，可以使政策得到貫徹實施。

因此，亞歐會議對亞洲國家的含意十分重要。首先，亞歐會議將帶來亞洲和歐洲之間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合作的提升與強化，提供亞洲的參與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極度依賴美國和日本的平衡籌碼。其次，作為既是亞太經合會又是亞歐會議的亞洲亞歐會議會員國能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領域，尤其是重要的區域間事務的關鍵性決策制定。舉例而言，尤其是在經濟範疇，亞洲國家在亞太經合會和亞歐會議的影響將在形塑多邊貿易和投資建制的未來路徑從而具有明顯且關鍵性的制高點。

第三，儘管非正式，但藉由亞歐會議，亞洲國家有效的正式化「東亞經濟核心論壇」（East Asia Economic Caucus, EAEC），亦即最先由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Mahathir Mohamad）所提議的理念。晚近該倡議逐漸制度化為一項「東協加三」的形式，⁵⁷亦可視為該方向的前進。雖然尚無一種涵蓋亞洲的政策協調機制，亞

⁵⁷ 「東協加三」係由韓國總統金大中所倡議，並且設想在東協成員國和中國、日本和韓國之間舉行定期的高峰會議。

洲遠遠落在歐洲和北美之後，但「東亞經濟核心論壇」的有效發動以及全新開展的「東協加三」將清楚地縮小該落差。第四，與第三項含意有關，預期未來在亞洲內部逐漸加強的合作領域將主要在經濟範疇。慮及東協內部相對低的貿易密集度，東協成員國的確需要逐步增加與東北亞國家的經濟交流。⁵⁸包括在亞太經合會和亞歐會議的經濟交流，此將引起需要並且導致亞洲國家之間的政策協調和團結的增進。此方面的問題在於，「東亞（東協加三）的自由貿易區在中期和長期是否具有可能性？」

最後，由於亞洲內部貿易和投資流的逐漸增加，同時亞洲的市場勢必將開放給非亞洲的國家。此將在包括亞太經合會和亞歐會議架構中發生，其中亞洲的國家同時是兩者的成員。因此，得以期待亞洲市場開放的速度和範圍將決定性的有賴於亞洲國家中協作 / 整合的程度。

⁵⁸ 晚近的統計數字顯示，東協內部的貿易密集大約為 20%，雖然對整個東亞對應的比率達到近乎 45%。因此，東北亞國家的對東協永續的經濟發展有重要的貢獻。

參考文獻

- Acharya, Amitay. *The Quest for Ident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Southeast As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Armstrong/Llyod/Redmo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World Politics*, 3rd edi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214.
- Bangkok Post*, March 24, 2004, p.6.
- Breckinridge, Robert. "Reassessing Regimes: The International Regime Aspects of the European Un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35, No.2. (1997), pp.173-187.
- Breslin, Shaun and Richard Higgott, "New Regionalism(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sia Europe Journal*, Vol.1, No.2 (May 2003), p.173.
- Czempiel, Ernst-Otto Kluge Macht. CH.Beck, Außenpolitik für das 21. Jahrhundert (München, 1999).
- Dent, Christopher. "From Inter-regionalism to Trans-regionalism? Future Challenges for ASEM," *Asia Europe Journal* (2003)1; pp.224, 232.
- Dittmer, Lowell. "The Emerging Northeast Asian Regional Order," in Kim, ed., *op.cit.*, p.331.
- Doidge, Mathew. "Inter-regionalism and Regional Actors: The EU-ASEAN Example," in Stockhof, van der Velde and Yeo, eds., *The Eurasian Space: Far More Than Two Continents*. ISEAS, Singapore, 2004, p.39.
- Friedberg, Aaron. "Will Europe's past be Asia's Future?" *Survival*, Vol.42, No.3 (Autumn 2000), pp.147-159.
- Gilson, Julie. "Defining Inter-Regionalism: The Asia-Europe Meeting (ASEM)," SEAS Electronic Working Papers, Vol.1, No.1, SEAS Website, 24 April 2002. <<http://www.seas.ac.uk/Research/SEWP/Vol1/Gilson.pdf>>
- Gilson, Julie.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Europe and East Asia," *Asia Europe Journal*, Vol.2, No2, (January 2004), p.197.
- Gilson, Julie. *Asia Meets Europe, Inter-Regionalism and the Asia-Europe Meeting*,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2, p.11.
- Haas, Peter., Robert O. Keohane and Marc A. Levy, *Institutions for the Earth* (MIT Press, 1993).
- Hänggi, Heiner. "ASE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Triad,"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Vol.4, No.1, (1999), pp.56-80.
- Hanoi Declaration on Closer ASEM Economic Partnership. <http://www.asem5.gov.vn/detail_new.asp?id=210&langid=2&menuid=87&curenmenuid=87>
- Hawdon, James. *Emerging Organizational Forms: The Proliferation of Regional*

-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Greenwood Press, 1996).
- Held, David and Anthony McGrew,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Debate* (Oxford: Blackwell, 2000).
- Johnston, Alistair. "Socia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he ASEAN Wa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Ikenberry and Mastanduno,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07-162.
- Keohane, Robert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 Keohane, Robert.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 Kim, Samuel. "Northeast Asia in the Local-Regional-Global Nexus: Multiple Challenges and Contending Explanations," in Kim, e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Northeast Asia* (Rowman&Littlefield, 2004), pp.45-51.
- Krasner, Stephen.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6, No.2, (Spring 1982), pp.185-205.
- Lukas, Andreas. "EC-ASEAN in the context of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in Guiseppe Schiavone, ed., *Western Europe and South-East Asia: Co-operation or Competition* (London: Macmillan, 1989), pp.105-116.
- Mingst, Karen A. *Essential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4).
- Mols, Manfred. "Cooperation with ASEAN: A Success Story," in Geoffrey Edwards and Elfriede Regelsberger, eds., *Europe's Global Links.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90), pp.66-83.
- Moore, Thomas.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Economic Dimension," in Kim, ed., op. cit., p.117.
- Nutall, Simon. "The Commission: protagonists of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in Geoffrey Edwards and Elfriede Regelsberger, eds., *Europe's Global Links.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90), p.146.
- Rawls, John. *The Law of the Peopl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Regelsberger, Elfriede. "The Dialogue of the EC/Twelve with other Regional Groups: a New European Ident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Geoffrey Edwards and Elfriede Regelsberger, eds., *Europe's Global Links.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90), pp.3-26.

- Reiterer, Michael. "ASEM: Value Added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o the Asia-Europe Relationship," *The Eurasian Space*, op.cit., p.17.
- Reiterer, Michael. Asia Europe: Do They Meet? Reflections on the Asia-Europe Meeting (ASEM). World Scientific/ASEF, Singapore, 2002; pp. 118-119. Heiner Hänggi, "ASEM's Security Agenda Revisited," in *The Euroasian Space*, op.cit., pp.93-118.
- Ridzam, Dato Deva Mohamed. "ASEM and Civil Society: Need for New Dynamic," *Bulletin of the European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Vol.7#10&11 (Oct.-Nov. 2003), pp.3-5.
- Rüland, Jürgen. "The EU as Inter-Regional Actor: The Asia-Europe Meeting (ASEM)," Paper Prepar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sia-Europe on the Eve of the 21st Century," Bangkok, 19-20 August 1999, p.2.
- Rüland, Jürgen. Inter-and Transregionalism: Remarks on the State of the Art of a New Research Agenda. National Europe Centre Paper no. 35 prepared for the Workshop on Asia Pacific Studies in Australia and Europe: A Research Agenda for the Futur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5-6 July 2002. <<http://www.anu.edu.au/NEC/ruland2.pdf>>
- Severino, Rodolfo. "Will there be a New ASEAN in the 21st Century?" *Asia Europe Journal* 2 (2004); p.184.
- Shanks, Cheryl Harold Jacobson, and Jeffrey Kaplan, "Inertia and Change in the Constellation of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1981-1992,"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0, No.4 (Autumn 1996), pp.593-627.
- Yepes, Cesar de Prado. "ASEM's Extra-regionalism: Converging Europe's and East Asia's External Projections towards Other Regions," in *The Eurasian Space*, op.cit., pp.58-74.
- "Koizumi Shrine Visit Ruled Unconstitutional," *Japan Times*, April 8, 2004, p.1.
- "Unity and Strength in Diversity," <http://europa.eu.int/comm/external_relations/asem/asem_summits/asem4/sec02_en.pdf>
- <http://europa.eu.int/comm/external_relations/asem/intro/index.htm>
- <http://europa.eu.int/comm/external_relations/asia/doc/com03_sea.pdf>
- <http://europa.eu.int/comm/external_relations/asem/asem_process/com94.htm#0>
- <http://europa.eu.int/comm/external_relations/asia/doc/com01_469_en.pdf>

A Study on Inter-regionalism: Implementation of ASEN

Kuo-hsiang Su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Nanhua University)

Abstract

EU encourages the formation of other regional groupings in its dealing with other partners. Interregional dialogues, cooperation or agreements are favored over bilateral ones, especially in the area of community competence. Thus, inter-regionalism offers an additional layer to multi-level governance which could facilitate the finding of solutions on a global scale in pre-discussing or even pre-negotiating issues to be taken up in a multilateral or global setting (agenda setting function). The recent proliferation of regional and sub-regional arrangements of varying degree of depth and scope confirm this poi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Asia Europe relationship.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the role of globalization in fostering inter-regionalism; the influence of inter-regionalism and new regionalism on identity building and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regime formation and institution building for effective interregional dialogues and cooperation.

Keywords: ASEM, globalization, inter-regionalism